

文史资料选辑

合 订 本

第17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17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	程 潜(1)
反袁回忆录.....	何 遂(47)
我在反袁护国期间的经历.....	张 钫(57)
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始末.....	钟 冰(73)
中华革命军山东反袁战争亲历记.....	辜仁发(104)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	杨思义(109)
汤芑铭在湘暴行及筹备帝制纪实.....	涂竹居(123)
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	郑廷玺(133)
旧海军南下护法及北归纪略.....	胡文溶 袁方乔(136)
政学会的政治活动.....	韩玉辰(156)
我所知道的徐世昌.....	张达驥(190)

质疑·补充·订正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质疑.....	毛啸岑(211)
对《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见闻》的补正.....	林志钧(212)
对《辛亥以后二十五年间贵州军政概述》的更正	黄乾堃(213)
对《“西北王”胡宗南》的订正.....	卢沛江(215)

对《蒋经国与青年军》的补正·····	高 梁(216)
对《四川讨贼军的兴起和失败》的质疑·····	唐仲殷(216)
关于《张绍曾事迹回忆》的订正·····	唐仲殷(217)
对《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所载三稿的订正·····	陆丹林(219)
关于日本恢复元帅称号时间的订正·····	王兆澄(220)
关于庚子国耻纪念碑的变迁·····	沈茂林(220)
对《曹锟贿选总统始末》的补正·····	罗介丘(221)
关于杨杏佛被暗杀经过的订正·····	杨小佛(221)
“巡按使”不是清代的官名·····	吴范寰(222)
对《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的补正·····	尹冰彦(223)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

程 潜

一 民国初年国内形势及党人在东京的活动

1913年讨袁失败后，国民党在长江、珠江流域各省的军事政治力量，被袁世凯用铁棒手段摧毁无余。国民党的激进分子，如宁调元、仇亮、熊越山、蒋翊武、张振武、方维、杨德邻、伍任钧、刘嵩衡等，被袁世凯残酷屠杀。国民党内一部分寡廉鲜耻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洪承点、唐蟒之流，被袁世凯利诱收买，堕落成为袁世凯的爪牙。其余大多数的党员，因国民党地盘丧失和国会解散，隐藏于内地或上海租界。这当中有一部分人是暂避锋镝，暗中聚集力量，作卷土重来之计；有一部分人则是万念俱灰，从此匿迹销声，不复过问政治。有一些党员，如陈炯明、朱执信、邓铿、徐维扬、姚雨平、古应芬等，或借住港澳，或逃往南洋群岛，依华侨为生，在华侨群众中寻找、发展革命力量。孙中山和黄克强，以及国民党内一部分骨干党员，如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廖仲恺、许崇智、章士钊、钮永建、程潜、周震鳞、李根源、李书城、张孝准、方声涛、程子楷、林虎、冷遹、陈强、耿毅、邹鲁、林修梅、林伯渠、易象、熊克武、杨庶堪、但懋辛、余际唐、何成浚、詹大悲等，先后逃往日本东京，过着流亡生活。1914年春间，各省议员如田桐、白逾桓、杨时杰、张知本、张继、覃振、谢持、王立斋等也因国会被解散，在国内不得安生，先后亡命聚集东京。流亡东京的国民党员，在一败涂地、创巨痛深之余，思想混乱，但大家都迫切要求总结经验教

训，检讨得失，准备继续开展反袁革命斗争。

当时，黄克强和各省党员开过座谈会，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共同研究。这四个问题是：(1)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2)国民党何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3)敌我两方形势的对比；(4)今后革命纲领和倒袁的策略。这四个问题，经过大家反复研究讨论，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认为，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不纯，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纪律松弛，意志薄弱，党员行动自由，不受党的规范约束，大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因此，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内教育，维护党的纪律，是今后建党的重要原则。

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家认为，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是由于没有掌握住可靠的军事实力。同盟会白手起家，自来只是从事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主要革命活动多在会党和新军里面进行。武昌首义后，两湖原有军队遭到黎元洪、谭延闿的百计摧残，破坏无余；而当时响应武昌首义的各省军队，又多握于宪政派之手，同盟会无权调度支配。迨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的反动气焰节节高涨的时候，同盟会就只有处处被动、一味迁就了。

对于第三个问题，大家认为，现在革命形势正处于消沉时期，而袁世凯的反革命力量则嚣张强大。袁世凯暴戾恣睢，所恃者两宗“法宝”：一是几个北洋陆军师，二是一批贪官污吏、狐群狗党。但袁世凯这两股恶势力都是不得人心的，是不能持久的，革命力量是一定能够发展壮大了的。

对于第四个问题，大家认为，在同盟会成立时，早有三民主义作为纲领。改组为国民党时，宋教仁主张迎合党内温和派的倾向，把政纲要求降低，使它和进步党的政纲相差无几，这是一个大错误。今后只有坚持三民主义的政纲，才能有效地组织一切反袁力量。至于倒袁策略，也应以三民主义政纲为举国倡，相机策动发难武力。

通过上面四个问题的讨论，流亡东京的国民党党员的思想混乱状态，有了好转。大家要求黄克强把讨论中形成的结论拿去和孙中山商量，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时，国民党同志因逃难而来东京者络绎不绝，人多，议论也杂。特别是对领袖人物的评价，开始发生分歧意见。大家对孙中山手创民国，万流共仰，咸无间言；但是对黄克强，却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黄克强从事革命，赴汤蹈火，奋不顾身：宋案发生，以在野之身主持军事，不计个人得失；湖口起义，驰赴南京，代替中山亲征，其爱护中山、保持领袖尊严的苦心，真是可白昼日。南京军事上的疲敝局势，不但黄克强无法挽回，就是孙中山也无法挽回，因此，苛责黄克强是不恰当的。另一派认为，南京各师都是黄克强留守任内组织起来的，宋案发生，黄克强又亲自负责指挥军事，南京军队未战先溃，事前没有周密准备，临事又轻弃基地，并且两次阻止孙中山出奇制胜的良谋，因此，赣宁之役南京方面的失败，黄克强不能卸脱责任。稍微了解宋案发生前后的政治局势和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情况的同志，都属于前一派，陈其美等则属于后一派。

有一回，陈其美和李烈钧议论癸丑之役南京方面军事失利的责任问题，陈其美意在言外地把责任通通推到黄克强身上，说党人没有听从孙中山的意见，及早发难，致使失败如此之速。李烈钧坦率地说：“国民党改组后，事权不一，癸丑之役失利，黄克强何能独负其责？辛亥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黄克强来负责吗？”陈其美听到这番意含揶揄的话，气得目眦欲裂，怒发上冲，但也只好吞声忍气，不加申辩而散。大家都知道，陈其美是一个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四捷”著名的小人，谁和他闹翻，谁就要吃亏上当，谁就要预作安排，来应付他凭空制造出来的纠纷和无端挑惹起来的矛盾。如今他听到李烈钧这么一番言论，知道一般军人对黄克强怀有强烈的好感，他是不会善罢甘休、中止其挑拨恶行的。

果然，事隔一周，黄克强就接到孙中山的手函，受到严厉的斥责。黄克强接到孙中山函后，感到晴天霹雳，目骇神惊，邀集我和李根源、张孝准、程子楷、冷遹、耿毅、陈强等谈话。黄克强把孙中山的手函交给我们传阅，神情泰然若素，说：“我从事革命，时时本着至诚，服从中山。去年南京失败，我应完全负责。中山来信责备我，如此其重以周。信里讲的，有一部分合于当时事实，一部分与当时的事实有出入。我请各位同来，为的是商量一下，看如何处理为好。”当时有人主张详细申辩，分清是非，以息浮言。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莽撞处理，说：“中山大公无私，度量宽宏，生平对于同志厚道和气，这个手函措词严厉，其中必有原因。自袁世凯用恶毒手段打击我党以来，我党已遭到严重失败，现在亡命海外，只要稍具血性天良，就应当惩前毖后，痛自反省，吸取教训，组织力量，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我以为以有用的耳目心思，应注意于敌人的行动，党内应该精诚团结，才能发挥力量，战胜敌人。从前失败，自然要认真检查，引为教训。如认为中山说的是实，望你以有则改之自励；如认为中山说的不实，望你以无则加勉自励。惟有不加申辩，然后可以息浮议，明是非，别有用心的挑拨伎俩也就不能得逞。”李根源说：“中山手函我也主张不作申辩。若加以申辩，则言论愈辩愈长，是非愈辩愈多。惟有不辩，则争论无由而起。大敌当前，民党领袖尤应精诚团结，不予敌人可乘之隙。否则破绽一露，不独影响革命前途，且貽敌人讪笑。”黄克强十分兴奋地说：“我诚心诚意接受同志们的建议。”

自此以后，孙、黄感情和好如初。黄克强还和孙中山协商，请寺尾丰组织一所政法学校，收容和训练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员。这所学校设在神田区，租有现成的讲堂。开学时，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萱野长知等一班日本人士，都来庆祝，犬养毅还作了讲演，黄克强也参加了开学典礼。政法学校的学生都是反袁的积极分子，以后在反袁斗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黄克强又和章士钊筹办了一个《甲寅杂志》，陈仲甫、李大钊、高一涵等纂著发梓政论。这时，许崇智衔

中山命由热海来东京和我们联系，我们和他开诚布公地谈论了两天，得出结论，一致拥护孙中山先生，实行三民主义，尽欢而别。随后，黄克强即偕李书城赴美游历。我们看到孙、黄关系不因小人挑拨而生齟齬，深为庆幸。

二 袁世凯称帝前的阴谋诡计

为了叙述护国斗争的方便，这里有必要稍为详尽地谈谈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滔天罪恶及其帝制自为的过程。

如前所说，袁世凯恃以暴戾恣睢的第一个“法宝”是反动的北洋军队。癸丑之役和随后一段时期，袁世凯的军事力量部署，除川、滇、黔、桂四省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李纯率第六师占据江西；张勋率辫子军占据南京；倪嗣冲率安武军占据安徽；龙济光率济军，由惠州进攻广州，逐走了陈炯明；刘冠雄率海陆军进入福州，吓走了孙道仁；汤芑铭率海陆军各一部，查办湖南，撤换了谭延闿；曹锟率第三师扼据岳州，使黎元洪成为釜底之鱼；杨善德率第四师扼据松嘉，使朱瑞成为瓮中之鳖；最后任段祺瑞为湖北都督，调黎元洪入京安置于瀛台。川、滇、黔、桂四省，僻处偏陬，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有限，力所不及；且各省情况复杂，袁世凯虽想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又势所不许。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自辛亥革命以后，地方各派小军阀争权夺利，倾轧割据，兵戎迭见，有如乱草蓬麻，非有较强的兵力和较长的时间，难望统一。云南虽然有一点军事力量，但滇、黔两省本为进步党人的活动场所。湘人蔡锷在滇、黔两省的潜势力很大。此时湘人力拒北军入湘，内阁总理熊希龄向袁世凯建议调蔡锷回湘接管军民两政。袁世凯对蔡锷放心不下，乃佯为赞成，先调蔡来京软禁闲废，旋用贵州都督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任汤芑铭接替谭延闿督湘。至于黔、桂两省，此时只有一些没有实力的地方部分，袁世凯鞭长莫及，只好先摆着，留待下一步来武力统一。计自1913年赣宁之役起，到这年年底，只有半年时间，袁世凯剿除革

命势力步步成功，曾先后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段祺瑞为湖北都督。袁世凯凭借武力、篡窃民国、荼毒天下的阴谋，到这时，算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袁世凯的第二个“法宝”就是网罗了一大批寡廉鲜耻的官僚政客，这是一伙奔竞钻营、翻云覆雨的社会蠹贼。他们攀龙附凤，为虎作伥，幻想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后亦可飞黄腾达。袁世凯也就利用这一批政治垃圾，导演了六幕天怒人怨的政治丑剧。结果，袁世凯作茧自缚，身败名裂，而这一伙政治帮凶也遭到了历史的唾弃。

袁世凯的第一幕政治丑剧，就是骗取正式总统。国民党在第一次正式国会里的地位，在宋案发生前是独占优势的；宋案发生后，则是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优势反而让给进步党了。袁世凯想骗取民国正式总统的宝座，必须利用国会；要利用国会，必须利用在国会中占居优势的进步党；要利用进步党，于是所谓“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的责任内阁——熊希龄内阁应运而生了。但是，按照临时约法是不能产生总统的，而此时宪法又没有完成。怎么办呢？袁世凯及其党羽，利用当时一般人的糊涂心理，倡言必须速正名分，提前选举总统，取得外国正式承认，才能使国家免受外国瓜分。这就是先产生总统选举法，选出总统，然后产生宪法这种逆行法的由来。1913年10月6日，按照这种逆行法，在数千便衣军警冒充“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之下，议会经过十四个钟头的三次投票，“选举”了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

袁世凯的第二幕政治丑剧，就是武力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破坏国会。袁世凯的总统宝座一到手，不出一月，即11月4日，就促使倪嗣冲、张勋、姜桂题等通电建议，以湖口之役为口实，以大总统经由国务总理副署的命令，解散北京国民党本部，取消国民党议员之资格，并派大批军警围捕国民党议员。凡是自湖口动兵之日起，挂名于国民党的，都追缴议员证书徽章，共三

百五十余人。但是两院犹足法定人数，可以开会，因又补行追缴八十余人，于是连在湖口之役以前脱党和跨党的国民党议员也都被追缴，共计四百三十八人。自此，国会便陷于不能开会的绝境。到1914年1月10日，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国会遂行解体。

袁世凯的第三幕政治丑剧，就是组织所谓政治会议，一脚踢开熊希龄的责任内阁。政治会议由总统府派员十人、国务院派员四人、各部派员一人、各行省派员二人组成，并指定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为议长。此时，熊希龄还在拟议废省以固中央、谋求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他把这个“大政方针”提到政治会议上讨论，立刻遭到揶揄反击。1913年12月29日，政治会议研讨了袁大总统提出的设立造法机关的建议（此即后来所谓“约法会议”），决定停止已失效用的国会的残余议员的职务。至此，那个副署了种种命令（停止国会、停止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特设造法机关）的熊内阁，对于袁世凯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熊希龄老骥恋栈，袁世凯一翻脸，过河拆桥，便唆使党羽，举发熊前在热河都统任内盗窃国宝案，把这位熊内阁搞得身败名裂，他的以名流标榜的“第一流内阁”也就垮台了。

袁世凯的第四幕政治丑剧，就是成立约法会议。所谓约法会议，实即政治会议的儿子。约法会议的组成人员：京师四人，二十二行省各二人，蒙藏青海地区八人，全国商联会四人。这些议员，都是袁世凯指派的御用官僚。约法会议于1914年2月18日开会，选出了一个变节的国民党名士孙毓筠作议长，施愚为副议长。约法会议唯袁的意志是从，袁可曰可，袁否曰否。约法会议替袁世凯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于5月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张到最大限度；一是8月18日通过了修正的总统选举法。至此，袁世凯无论在形式上或事实上，都已经成了中华民国的独裁元首。袁氏乃下令取消国务院，实行所谓“总统制”，派徐世昌为国务卿，各部部长由孙宝琦、朱启钤、段祺瑞、刘冠雄、章宗祥、梁敦彦、张謇、汤化龙等一班老官僚凑数担任。

袁世凯的第五幕政治丑剧，是恢复前清制度，推行复古运动。文官设卿、大夫、士三等九级，授徐世昌以下一批官僚上中下卿、上中下大夫等级官位。自新约法公布，袁世凯已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不久又发布了祀孔令，预备到了冬间还要祀天。黼袞法服，招摇过市，古香古色，众目睽睽，叹为未曾有的奇观。到11月初间，北京的复辟风说，几有“满城风雨”之势。

袁世凯的第六幕政治丑剧，是废督整军，虚省重道，加强中央军政集权。从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在南北和议中，在抵制南往就职临时总统中，在对付民国二年反袁战争中，在毁约法、解散国民党、扼杀国会的倒行逆施中，处处时时都依靠北洋军队这副“撒手铜”，夤缘时会，取巧投机，侥幸得到一时的“成功”。但也就在这个时期，袁世凯这个军阀大头领统驭下的各派中小军阀的势力，随着膨胀壮大。在袁世凯看来，这些对自己效过忠、立过功的各地军阀势力的崛起壮大，将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藩镇割据，这是附骨之疽，势必危及自身安全。因此，袁世凯就着手废督整军，虚省重道，削弱地方的军权政权。袁世凯把都督改为将军，只说废督整军，而说不说裁军，这是免得北洋老粗们见疑而心生变异。把各省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削弱他们的职权，减轻他们的任务，实者虚之。把观察使改为道尹，加重他们的权限和责任，虚者实之。这些措施，统限于1914年6月底完成。从此全国的军政大权，就统一于独夫袁氏之手了。

袁世凯的六幕政治丑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登上皇帝宝座。在袁世凯依恃两宗“法宝”导演六幕政治丑剧期间，除了遭遇白狼在河南一次声势壮大的事变外，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畅行无阻的。到了这时，袁世凯改元登极的事项筹备就绪，这位“真命天子”就要临朝了。但是，历史是这样残酷无情，国内各派反对帝制力量的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破灭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这时候的皇帝梦正在高潮时刻，他继承李鸿章的衣钵，采取所谓“以夷制夷”的两面政策，牺牲

国家的领土主权，企求暂时的苟全，以达到登上皇帝宝座的野心。袁世凯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他既与英国亲善，又与德国交好，因此，协约国和同盟国两方，当时都可以在北京作对等的外交活动。其实，在帝国主义真刀真枪、兵戎相见的时候，腐败无能的袁政府想保持中立，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其他帝国主义者在欧洲忙于战争、无力东顾的时候，首先就给了袁政府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这时正是大隈重信内阁执政，以参加协约国为名，要求“继承”德国在胶州的权利。8月23日，日本用海军掩护，派广岛第五师团为主力在龙口及莱州登陆，占领潍县，控制胶济全线，包围胶州湾，战争七十余日，于11月7日攻下了青岛，随后又扩大其势力及山东全境。

日本政府兴师动众，侵占胶州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它的胃口大得很，想趁机吞并中国，独霸东亚。大隈重信看穿了袁世凯心中的秘密，屡次表示，如果袁世凯称帝，属于中国内政问题，日本政府决不干预，只要求袁世凯能够顺应国内外情势，忠诚与日本合作，达到“日中共同繁荣，彼此皆大吉利”的目的。有人或问：大隈重信为什么怂恿和支持袁世凯称帝呢？这是因为大隈重信看准了，袁世凯要称帝，日本就可以借此机会对他进行要挟讹诈，狠狠地敲一笔竹杠，果然于1915年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另一方面，袁世凯称帝，中国内部一定陷于长期混乱，日本正好趁火打劫，肆行侵略。

三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准备工作

在袁世凯酝酿帝制的时候，中国国民党的主要人物，都冲破了袁世凯的通缉网罗，作为政治亡命者侨集于日本东京。这时，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定名称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在新党尚未宣布成立，就以青帮首领身份窃据组织部门要津，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在此时期，孙中山先生曾派居正、覃振对我们说明入党必须捺指印的意义，希望我们尽弃前嫌，参加中华革命党，共同奋斗。我们表示对孙中山先生忠诚拥护，但不愿与帮会合作，现在既不入党，也不会另立名目，妨碍革命的进行，请居、覃将这层意思转陈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明白了我们的意旨，也没有勉强要我们加入中华革命党。

当时我们在东京有一部分同志，每星期都举行谈话会，分作四个题目，来研究国内情势和革命进行方针。第一、主义。我们认定，无论革命或建设，都必须有主义以为指导。如果没有主义，不但不能打倒袁世凯，就算打倒了袁世凯，也不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认为三民主义，较之西方的民主义议会政党政治，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能把中国建设为富强之邦。第二、量敌。我们认定，当前主要的敌人是万恶滔天的袁世凯，而袁世凯则有四种恶势力作为他的羽翼：一是北洋军队盘踞要津；二是反动官僚遍布全国；三是土豪恶霸横行乡里；四是会党游民弥漫当道。这四种恶势力长期以来流毒社会，鱼肉人民，我们和袁世凯作斗争，必须斩草除根，把这些恶势力消灭尽净。第三、党派。我们认定，进步党是一个政治危险性最大的政治集团。它是前清立宪派的化身，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所以甘为独裁者所笼络利用，拚命和国民党作对。袁世凯毁约解散国会，把进步党抛在一边，但是这个投机取巧、覆雨翻云的政治集团，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肆行争夺。因此在反袁斗争中，我们要注意进步党的动向。第四、宣传。我们认定，必须向全国广泛宣传，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才能取得反袁斗争的胜利。

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我们为了对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详尽的探讨，组织了一个欧事研究会。为什么要取名为欧事研究会？对于这个名称，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下来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想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来可以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二来可以借此联络侨

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互相商榷；三来不怎么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联络，互通声气。

在欧事研究会成立之前，侨居日本的同志，如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等二十八人，曾联名发出了一个停止内争、一致对外的通电。在通电宣言上署名的，大体上就是后来欧事研究会的成员。通电宣言是章士钊起草的（见《甲寅杂志》），略谓：我们秉着爱国天良，反对独裁之志，始终不渝，即使在外患凭陵的时期，我们对袁世凯也不作丝毫让步，不存丝毫幻想；但我们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首先是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紧逼的侵略。这个通电得到了许多人的同情，也招致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自浅识者观之，以为我们声称停止内争，对袁世凯表白心迹，一定有所企图。自袁世凯观之，我们的通电宣言，无异给他的通敌卖国、帝制自为，又增加了一层障碍。袁世凯痛恨之余，就贼喊捉贼地诬蔑我们，说我们是“借寇自重”。帝制运动公开化之后，欧事研究会的活动渐渐及于国内，成为反对帝制的一种势力。

在成立欧事研究会的同时，我们还积极筹划倒袁。我们在东京看到日本报纸关于袁氏进行帝制运动的新闻报道，比国内的报纸更为明朗具体。我们分析了国内形势：自1913年讨袁失败后，中国三大流域的各省，都被袁世凯千方百计地派遣爪牙盘踞，只有长江上游西南一隅，袁世凯因鞭长莫及和兵力有限，尚未吞噬。虽然袁氏派陈宦率北洋军入川接管了川政，但大西南的云南，仍是袁氏力所不及的地方，可以作为反袁起事的基地。我们认为云南有四个优越条件：（1）地处偏僻险阻的边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优胜之势；且四川地方军队既杂又乱，陈宦一时统一不起来，可以作为云南的有力屏障。（2）云南两师陆军的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所有中下级军官，都是讲武堂的学生，学术优良，思想纯正。云南讲武堂是李根源筹办的，他曾邀集同学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等，参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教程，结合中国实际所需要的革命精神，认真训练和教育学生，因此造就了不少革命人才。（3）云南陆军所使用的军械，都是德

国克虏伯厂的精良产品，是在清末以重价从德国购来的，其枪炮火力之强，超过南方各省的军队。(4)云南当时的几个主要当权人物，如唐继尧、罗佩金、殷承琳、叶荃等，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者有革命倾向的人。因此，如果袁氏称帝，我们可以成功地在云南组织起义，为全国倡。但是，我们也预见到，即使把袁世凯打倒了，袁氏的党羽还要继续和我们作斗争；跟我们同声讨袁的队伍，将因政见的不同而发生分化，其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力量，也还要继续和我们作斗争。而我们内部的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章士钊的调和论，未必可行于中国，我和李根源对此也常有辩驳。总之，这一时期，我们一方面兴奋激动，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则是瞻望前途，忧心忡忡。

这年8月，正是袁世凯筹备帝制紧张的时候。在北京，以筹安会为核心的一批人物，按照计划，纷纷密电各地，如何组织国民代表团，如何指派劝进代表，如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闹得乌烟瘴气。我们在东京的欧事研究会也积极探讨策划，大家感到，云南方面虽然联络得极好，但能否毫无阻滞地进行发动，还是没有把握。这时王九龄从昆明来，告诉我们，自陈宦率军入川后，云南全省大为震动，人们知道云南已成为袁氏的眼中钉，俎上肉，危险万状，因此群情鼎沸，军队反袁的情绪更是继长增高。王九龄谈到的情况，和我们前此派人联系所得来的情况，有些出入，不能据此决定行动。由于方声涛和云南的中级军官谊属师生，有许多社会历史关系，进行工作诸多方便，因此我提议请方声涛亲自赴昆明一行，探明情况，进行联络，策动工作。大家同意这个提议，并且和方声涛约定了暗号，如联络策动有所进展，我们接信后就立刻回国共策进行。

四 在上海的策划活动

方声涛经上海、香港、越南，到达昆明。9月中旬，方从昆明来信称，“尚须多方调查”；10月初又来信称，“销路甚好”；10月10日来函，要我们速到上海面商。大家商量决定：我和李根源为欧事研

究会的干事，应首先回国；其余同志，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陆续回国。我和李根源两人于11月3日由横滨坐邮船动身，两日多就到了上海。在船上遇见朱卓文，他把我们当作袁党，肆意谩骂一通，我们只好付之一笑。到上海后，我们受检查盘问比朱卓文还严，他这才恍然大悟。其实，我们这次能够闯过检查关，也确实有些侥幸，因为李根源那副尊容，是最易被人发现识破的。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法租界宝康里，方声涛则已于先一日返沪。他说：云南的两师陆军，团、营级的主要骨干，如邓泰中、杨蓁、刘云峰、华封歌、董鸿勋、黄永祉、赵钟奇等四十余人，都极端反袁，久已跃跃欲试。他们对蔡松坡的情谊很深，听说蔡在京的寓处被搜，情绪十分激昂，并已秘密派人赴京，欢迎蔡离京回滇主持大计。我们听到方声涛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通知张孝准，要他积极与蔡联系，掩护蔡出京。此时，和云南关系极深的李烈钧，也从香港派人到云南联系策动。不数日，章士钊、耿毅、冷遹、程子楷等，都先后从日本回到上海。此时袁氏叛国称帝，人心丧尽，上海社会舆论反袁的情绪，已达极点。我们这些人先后聚集上海活动，虽然袁世凯的密探爪牙遍布上海，亟欲加害，但他们害怕强大的群众舆论压力，也不敢肆意下手。后来陈其美回上海和我们联系，并保证我们在上海行动的安全，我们也表示愿意和他合作，共同奋斗。

我们的发难基地和发难主力，自然专恃云南。但是我们必须在全国广大地区及早发动讨袁力量，发挥互相策应的作用。这一点，是在我们归国之后才逐渐想到的。我和李根源等商妥，重新规定行动方针：（1）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而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2）国内平日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3）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我们安排分配了一下各人的任务：耿毅担任北方同志的联络工作；熊克武回四川组织地方讨袁军，为云南主力军的向导；柏文蔚、钮永建、冷遹策划苏、皖、浙地方军队的发动；林虎担